

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丛书

新阶段·新模式·新格局

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李安方◎著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丛书

新阶段·新模式·新格局

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李安方◎著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编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阶段·新模式·新格局: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李安方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08 - 12278 - 9

I. ①新… II. ①李… III. ①中国经济—开放经济—研究 IV. ①F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5382 号

责任编辑 鲍 静

封面设计 范昊如

· 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丛书 ·

新阶段·新模式·新格局

——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李安方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12,000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2278 - 9/D · 2486

定价 22.00 元

“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丛书”

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徐 麟

编委会副主任：李 琪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冯小敏 张 雄 李友梅

李明灿 沈国明 季桂保

林尚立 荣跃明 桑玉成

诸大建 黄力之

总 序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徐 麟

在全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之际，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撰写的“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丛书”18种，陆续同读者见面了。

党的十八大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全面部署，对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党和国家事业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开启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征程。

深入研究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研究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深化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十八大精神的认识，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我们在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后即设立十八大精神系列研究立项课题，后又设立委托课题，聘请首席专家组织队伍开展十八大精神研究，目的就在于不断推进和深化对十八大精神的学习和研究。

党的十八大精神，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十八大精神，必须紧紧围绕这个根本加以展开。在选题策划上，我们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十八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新部署。重点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制度和理论体系,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突出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旗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高举的伟大旗帜;重点论述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突出反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和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突出反映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重大思想和部署,推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等等。

参与研究撰写的专家学者在课题论证和书稿撰写过程中,力求以世界视野、历史眼光,正确反映十八大和我们党几十年来形成的宝贵思想、观点和论断,深刻反映我国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有理论概括,又有实证分析,力求做到观点鲜明、逻辑严谨、文笔生动、富有新意。

随着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实践的不断深入,我们对十八大精神的研究也需要不断深化。我们要在过去一年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深入研究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研究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研究上海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把对十八大精神的研究提高到新水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伟大事业,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未来10年,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改革未有穷期,发展永无止境。在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的新征程中,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需要我们不懈探索实践,奋力开拓前进。衷心希望上海理论界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紧跟实践要求,不断解放思想,继续

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立足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推进“四个率先”,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回答新问题,努力提出富有影响力的理论成果、体制设计和政策建议。

是为序。

2013 年 12 月

目 录

Contents

总 序	1
第一章 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与开放型经济发展理念 创新	1
一、中国对外开放的曲折历史进程	2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推进	11
三、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创新发展	22
第二章 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与外部挑战	29
一、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与结构性变化新特征	29
二、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历史性新机遇	38
三、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	43
第三章 创新开放模式,完善我国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50
一、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理论内涵	50
二、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与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	55
三、优化开放型经济的产业结构,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68

第四章 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

优势	74
----------	----

一、中国传统开放型经济发展优势日渐弱化	74
二、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新主题	77
三、培育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的战略内涵	82
四、培育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的政策取向	85

第五章 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90

一、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90
二、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体制问题与制度性挑战	97
三、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方位和重点领域	100

第六章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思考 107

一、科学研判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面临的外部环境	107
二、厘清对外开放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功能定位	113
三、积极主动谋划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新格局	120
四、统筹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重塑新一轮开放的动力机制 ...	123

后记 128

第一章

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与 开放型经济发展理念创新

开放型经济是相对于封闭型经济而言的一种经济运行模式。在开放型经济中,生产要素、商品和服务可以比较自由地跨国界流动,从而实现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一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可以将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更密切地联系起来,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将对外开放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以来,在党中央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中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报告同时强调“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创新开放的模式”,“形成出口竞争新优势”,“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等一系列指导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战

略思想。^①十八大报告的这些论述是党中央在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世界经济格局和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新形势下,立足全球视野,把握战略全局,在新的高度上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重新审视,与沿用多年的“扩大对外开放”提法相比,是一种战略超越和理念创新。这一提法顺应了中国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强调了中国重视开放的质量与效益,体现了中国实施更加积极主动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凸显了内外统筹的科学发展思路。

一、中国对外开放的曲折历史进程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是,中国走向开放的历史进程却曲曲折折,布满荆棘。在千年的发展史上,中国从历史上的相对开放到近代的闭关锁国,再到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全面封锁,“文革”之后经过对外开放的酝酿和起步,党中央最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形成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之后,中国借助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的机遇全面实施对外开放战略。进入新世纪后,以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标志,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对外开放与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客观进程。

(一) 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开放

历史上,中国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它以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闻名世界,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和思想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

1. 中国古代的对外开放思想脉络

早在汉代之前,我国的先民就通过海陆两路同域外国家、民族开展了一定的经济、文化交往。现有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表明,夏商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时期,我国的中原地区就已经和新疆以及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间存在交通、贸易通道。汉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多次派出使者出使西域,对促进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and 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隋唐时期,中央政府采取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中外经济交往频繁。隋朝时,政府曾专设四方馆用以接待东、西、南、北四方少数民族及外国使臣,其任务是“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国及互市事”。^①唐代时,中国的对外开放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唐朝以其博大的胸怀吸收着各种外来文化,同时又以其高度的文明影响了周边各国。当时中国与日本、朝鲜、印度以及中亚、西亚各国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唐都长安是当时中外交流的一个重要舞台。公元714年,唐政府为了适应海外贸易发展的需要,曾在广州设置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市舶使,标志着自唐至明朝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市舶制度的诞生。^②由于鼓励对外开放,隋唐时期,外国使节、商人、学者、留学生、僧侣等纷至沓来,当时称之为“住唐”,鼎盛时多达10万人。^③

宋朝时期,中央政府继续强力推进“对外开放”政策,来华的外国人数甚至超过唐朝,开封成为当时全球拥有外国侨民最多的国都。这些外来移民中,除了来自西域、阿拉伯和朝鲜、日本等国,还有从非洲、欧洲等地远道而来的,他们的身份包括驻华使臣、武士、僧侣、教徒、商贾、猎手、艺人、奴婢和留学生等。同时,也有不少宋人积极向外交流,特别是大力拓展海上丝绸之路,当时阿拉伯商人与宋朝通商较多,宋代船只已经航行于印度洋各地,包括锡兰(斯里兰卡)、印度次大陆、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甚至到达非洲的索马里。在此时已有“南洋”的说法,中国人开始陆续移民到南洋,福建的泉州是当时世界最大贸易港。^④

① 王静:《汉代蛮夷邸论考》,《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② 易淼森:《从隋唐时期开放的对外政策看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③ 李妍:《对外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④ 郭东旭:《宋朝招商政策探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元朝统一全国后,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实行对外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元朝重建市舶司,招徕贸易。这一时期,中外贸易往来异常频繁。东南沿海的昆山、庆元、温州、福州、泉州、广州等都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另外,蒙古帝国的建立也使欧、亚大陆上陆地、海路交通范围比前代大为扩展,庞大疆域可以说从陆路通往西亚至欧非的路线畅通无阻,可以直抵俄罗斯与东欧,到达阿拉伯、土耳其和非洲。海道则可以到阿拉伯、印度、波斯以及非洲等地。由此进入了比汉唐更为繁荣的中外交流时代。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元朝统治者开始从世界范围内认识元朝所处的历史地位,逐渐形成了“四海为家”的对外开放思想和积极的开放观念。^①

到了明朝,中国的对外开放开始由盛而衰,明后期,政府多次实施海禁,推行朝贡贸易,对外贸易时断时续,逐渐采取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这一时期可以算是中国对外开放史上的一个停滞甚至倒退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中华文明走向衰落的开端。^②明朝初期,政府曾经实行较为自由的贸易政策,曾重开和新建市舶口岸,但后期由于北方元朝残存势力和沿海一带倭寇骚扰,明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开始实施严格的海禁政策,明太祖时期严禁私人出海经商,只允许对外贸易在政府之间通过“朝贡”与“赏赐”的形式来进行。政府在广州、泉州、宁波设市舶提举司管理外贸,对允许前来“朝贡”的国家发给“勘合”(凭证)。规定期限、人数、船数,并指定入境地点进行交易,未经允许或不按规定前来者,概予拒绝。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恢复广州等地的市舶提举司,同时派出使臣马彬前往爪哇、苏门答腊等国,李兴前往暹罗,尹庆前往满刺加(今马来亚)、柯枝(今印度西部),招徕贸易。从永乐三年(1405年)起,先后7次派遣郑和率领声势浩大的舰队,前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历时28年,访问了30多个国家,

① 李莹、刘春霞:《试论元朝之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② 孟志军:《对外开放的历史启示和中国道路》,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从而使我国对外贸易日益兴旺。到了明朝后期,由于南方倭寇日渐猖獗,明朝几次罢除市舶,停止对外贸易,在海禁期间,仅有广州等少数港口进行少量对外贸易。

清朝的近 200 年间,对外开放先后经历了从开海到禁海,从开海设关到“多口通商”,再到“一口通商”的演变过程,其间夹杂着复杂的满汉矛盾,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国内洋务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等一系列因素。总体上处于一段相对封闭的历史时期,丧失了与西方国家同时崛起的历史机遇。清朝初期,为了抵御和消灭明朝残余势力,清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对外贸易的限制措施,严禁商人出海,限制来华外商,颁布实施迁海令,设立海关管理沿海各省对外贸易。收复台湾后,江浙闽粤的海禁解除,不过,清政府对商船的吨位和出海贸易的商人、水手作了诸多限制。随着来华外商人数的增加,清政府在 1686 年(康熙二十五年)授权广州海关,挑选出 13 家有实力的商行经纪人负责与外国商人进行生意洽谈,并且掌握着征缴关税的大权。这样,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正式成型。这一具有官方性质的商业组织是当时清朝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鸦片战争之前,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发展,清朝对外贸易越来越被动,由于中西文化的礼仪差别,清政府在国外使节“跪与不跪”的争论中,逐渐关闭国门,18 世纪后期,清政府关闭多处海关,只许广州一口通商,对外贸易的限制政策达到顶峰,中国逐渐在世界贸易中陷入被动,丧失了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自此,中国的国门洞开,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在甲午战争前,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开放商埠 30 多处,并在通商口岸设置租界,作为外国对华经济侵略与控制的根据地。据统计,1894 年甲午战争时,中国进出口总值约为 3.1 亿海关两(1 海关两折合 1.558 银元),入超达 2 840 万海关两,到 1931 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23.4 亿海关两,入超达 5.2 亿海关两。^①

^① 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22 页。

2. 中国近代的对外开放实践探索

在近代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深感闭关锁国政策与外来经济侵略的屈辱,着手进行自强不息的社会改良运动。早期为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清政府开始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利用外资发展民族经济,通过“进口替代”实现民族自强,一批“实业救国”的先驱掀起中国对外开放的小高潮。

辛亥革命后,中国开始了以国家权力推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对外经济交往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民族资本家在内地增开商埠,发展对外贸易,推进实业强国,同时争取关税自主,收回部分租界,恢复对外贸易主权,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自主权有所提高。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外国来华投资上升,中国市场的开放度进一步扩大,这一阶段中国的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据统计,1917—1927年间,中国的年均进口增长率高达7%,年均出口增长率也达到6.4%。按照当时国际联盟的统计,1913年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排名为第13位,到1924年则上升到全球第10位。^①

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和国内解放战争,中国的对外贸易虽然在动荡中延续,但受战时影响,国民经济崩溃,已经谈不上真正意义的对外开放了。

(二)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秉承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前提下,立足中国实际与外国开展独立自主的经济交往。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严峻复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对外交往时,侧重点主要在政治领域,与国外的经济、文化交往主要是为政治服务,很多经济方面的对外开放思想并没有能够付诸实施。

1. 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为主要对象的“一面倒”型对外开放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表现为打破西方国家对华经济封锁和孤立政策,实行对苏联“一面倒”的国际经济交往政策。早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7页。

在 1949 年南京解放之后,美国就中断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对中国解放区的经济援助工作,并对一切可供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物资实施管制和禁运,对中国解放区的一般贸易进行种种歧视性限制。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华全部公私财产,并且禁止美国注册船只开往中国,中美之间的贸易完全停止。同时,美国还发起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鼓动 50 多个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切断中国与西方的对外经贸联系。

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对华经济封锁,当时的中央政府根据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外部国际环境,采取保持并巩固与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对外经济联系的同时,利用西方国家的内部矛盾,以英国为突破口,发展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当时,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中国只能选择同以苏联为主要对象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发展贸易关系。据统计,1950—1959 年 10 年间,中国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占我国同期贸易额的比例一直保持在 70% 以上,其中与苏联的贸易额占比约为 50%。在技术引进方面,苏联也是中国最主要的技术提供国,50 年代,中国共与苏联签订 304 项成套设备项目和 64 项单项装置合同^①,为新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初步基础。

除苏联外,这一时期中国还非常重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合作与交往。1955 年,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积极倡导亚非各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了打破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封锁、禁运”,换取国家建设急需的外汇,当时的外贸部和广东省于 1956 年秋尝试举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并获得成功。考虑到广州是中国南方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并且毗邻港澳,具有地利人和的优势,中国政府于 1957 年正式创办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由于选址广州,而简称广交会。当年两届交易会出口总额 8 687 万美元,约占当年全国创收现汇的五分之一。从此,广交会成为中国打破西方封锁,发展对外经济的重要举措,50 多年来,广交会

^① 陈文敬、李钢、李健编:《振兴之路:中国对外开放 30 年》,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 页。

已经成功举办上百届,交易额逐年增长,这也充分体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即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为了发展经济,提升实力,灵活利用世界形势和国际交流机会发展对外经济合作。^①

中国 50 年代的对外开放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于 1956 年 4 月 25 日所做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全面阐述了向外国学习的思想。他提出中国向外国学习是全方位的、多方面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他同时指出:“对外国科学、技术和文化”,“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②

2.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苏夹击下艰难的“反帝反修”对外开放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苏两国由兄弟关系走向敌对关系。苏联在中国的投资、贷款、技术援助和专家学者全部撤回,中苏边境甚至发生局部武装冲突。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对华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并没有缓和,中国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双重夹击下,对外经济合作几乎停滞,陷入几乎完全被封闭隔绝的境地。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那样,“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条件,人家封锁我们”。^③

为了打开对外交往局面,扩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政府主要从两个方面拓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一是通过对外

① 孟志军:《对外开放的历史启示和中国道路》,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7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40—742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 页。